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4.10.002

陈绍锋:“地区主义研究七十年:理论演进及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10期,第10-27页。

CHEN Shaofeng, “Regionalism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Its Releva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cific Journal*, Vol.32, No.10, 2024, pp.10-27.

地区主义研究七十年:理论演进及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

陈绍锋¹

(1.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地区主义研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重要板块,但学界对地区主义理论演进的脉络及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性仍缺乏清晰的认识。论文尝试从核心研究议题、主要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三维度,探析过去七十多年来地区主义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并阐述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学理联系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表明:地区主义研究大体遵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脉络。其在部分研究议题上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旨的变化;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上,从旧地区主义对单一变量,即权力/利益或制度的侧重,到新地区主义对权力/利益和制度的双变量的组合分析,过渡到比较地区主义对不同研究范式的折中,即除上述变量外,还将认知、观念、文化等纳入分析,这一变化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代发展的内在逻辑。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复兴,未来的地区主义研究将延续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更多关注比较地区主义、地区一体化制度的武器化、去一体化,以及地区整合、技术竞争、产业链重组与国家安全的互动等议题。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比较地区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4)10-0010-18

地区和地区主义^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卡赞斯坦(Katzenstein)直言我们正迈入“地区构成的世界”(world of regions);地区既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又是世界政

治的驱动力。^②牛津大学福西特(Fawcett)教授坚信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势不可挡,并不断延伸到其他新的领域。^③“地区现在遍布全球,对于从贸易到冲突管理等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的运作

收稿日期:2024-05-09;修订日期:2024-08-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研究”(20AZD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绍锋(1974—),男,江西赣州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能源问题研究、地缘经济竞合、亚太区域化等。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尽管有学者将地区主义等同于地区一体化,但出于研究便利,笔者倾向于认为地区主义包括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化。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reface.

③ Louise Fawcett, “Exploring Regional Domain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3, 2004, p.431.

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世界秩序。”^①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是首个以地区为分析单元分析不同地区安全关系的理论,凸显了地区在当今世界的重要影响力。

诸多学科均对地区主义现象予以关注,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区层面的问题,包括一体化/区域化和联盟经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层面的核心议题之一。^② 尽管地区主义研究存在不同学科的视角,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嵌入特定物质关系的政治工程”,意在建构覆盖国际和国内的制度网络,^③因而,这种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相互交叉与作用的特性使得地区主义研究天然地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较为契合。与比较政治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其他学科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侧重的是地区一体化组织或制度的政治经济成因,发挥作用的政过程,及其导致的特定地区内经济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的跨境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间关系,以及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或者反过来,国内政治、国家间关系、国际体系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尽管地区主义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如此密切,但学界对于地区主义的理论演进及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之间的联系仍不甚明了。本文主要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地区主义研究,特别是相关理论在过去七十多年来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同时阐述地区主义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化的内在关联性。^④

瑞典学者索德鲍姆(Söderbaum)将地区主义划分为早期地区主义、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⑤ 借鉴这一分类,本文着力分析地区主义理论演进的逻辑及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关联性。旧地区主义研究大体从二战后开始至冷战结束前,新地区主义从冷战结束后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此后至今的地区主义研究被视为比较地区主义。

不同学者对“地区主义”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学者将之界定为一个以国家间经济政

策合作和协调为特征的政治进程。^⑥ 该领域著名学者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博泽尔(Börzel)和里塞(Risse)认为,地区主义是指“在至少三个国家之间、主要在国家推动下建立和维持正式地区制度和组织的过程。”^⑦除制度要素外,一些学者认为它还是一种多边主义观念和价值观。^⑧与前述观点强调国家的作用不同,耿协峰将之定义为:“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人类群体之间在地区层次上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互动的一种特殊实践(地区合作或地区一体化)及其思想表现”。^⑨因此,学界对于地区主义是否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其主要内容是围绕政策协调、制度建设抑或观念建构尚存争议。下文将按代际顺序就地区主义理论的演进及其逻辑进行分析,结论部分对其未来进路予以展望。

① Rick Fawn, “Regions and Their Study: Where from, What for and Where t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 Issue S1, 2009, pp.5-35.

② 另外两个层面包括全球层面的问题,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跨国生产等;国家层面的问题,如发展、转型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等。

③ Marianne H. Marchand, Morten Bøås, and Timothy M Sha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Regionalism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0, No.5, 1999, pp.897-910.

④ 理论是对某种或某类现象或事实的系统解释,目的是对事物或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做出系统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所谈的地区主义理论是指那些主要涉及因果关系或因果机制的地区主义研究。

⑤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⑥ Albert Fishlow and Stephan Hagg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Research Project on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1992; Stephan Haggard,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0-49.

⑦ [德]塔尼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耿协峰译:《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⑧ Michael Schulz, Fredrik Söderbaum, and Joakim Öjendal, *Regionalisation in a Globalising Worl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Actors, Forms and Processes*, Zed Books, 2001, p.5;王学玉:“国际关系研究的地区主义视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3期,第69-75页。

⑨ 同⑦,第6页。

一、旧地区主义研究: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范式之争

本文将从研究议题、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三方面来探析地区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

1.1 研究议题

旧地区主义研究主要涵盖如下三类议题:(1)早期侧重寻找消弭战争、促进发展的方案。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如何避免战争,实现和平,是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旧地区主义研究的首要议题。旧地区主义理论延续了早期地区主义的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二者既为地区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又对战后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设想,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们倡导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从而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2)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旧地区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转向地区主义的过程研究,主要分析其动因及动力。关于地区一体化的动因,新功能主义突出经济动因,认为其有利于促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和扩大规模经济。现实主义则侧重一体化的政治动因,强调全球或地区主导国所发挥的作用。加州大学教授拉帕波特(Rappaport)认为,出于增强西欧盟友自身防卫能力的考量,美国对西欧国家间的地区整合予以支持,实施了一种“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让位于“促统和投喂”(unify and fed)的战略。^①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华莱士(Wallace)也认为,驱使欧洲人和美国人支持一体化的首要动因是政治因素,即遏制德国及在西欧创造持久和平。^②

关于地区一体化的动力,不同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点。功能主义强调功能动力,认为技术领域的紧密合作将扩展到政治领域,而新功能主义注重一体化过程中地区性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坚信外溢是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包括功

能外溢和政治外溢。^③作为政府间主义的奠基人,霍夫曼(Hoffmann)推崇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认为国家利益方为推动一体化的动力。与之相似,新现实主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追求权力以提升其在国际体系地位的工具,而新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动力。

(3)与此相关的议题是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国家间合作及地区和平的作用。沟通理论强调国家间交往和沟通是克服现实主义所假想的“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④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多伊奇(Deutsch)认为,地区性国际组织有助于构建和维护共同体、推动制度化进程以及促进和平变革等,从而为一体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⑤作为二战后关于多边机构的主流理论,功能主义强调地区组织不可或缺,认为它们不仅能提供国际公共服务,而且有助于建立共识基础上的持久和平。^⑥新功能主义不否认成员国的重要性,但更强调地区组织秘书处以及地区一级的利益集团在推动一体化的作用。^⑦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地区组织有助于促进成员国的交流与合作,调解争端和协调利益,并推动制度建设。

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地区组织的

^① Armin Rappapo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First Phas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5, No. 2, Spring 1981, pp.121-149.

^② William Wallac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③ 功能外溢,即特定功能领域的良性合作将溢出并促进其他领域的合作;政治外溢,即经济精英和利益集团基于深化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和福祉预期,将其游说努力转向地区层面,从而增加进一步一体化的政治压力。Liesbet Hooghe & Gary Marks, "Grand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6, Issue 8, 2019, pp.1113-1133; Stephen George,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larendon Press, 1985, p.22.

^④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

^⑤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8.

^⑥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Quadrangle Books, 1966, p.31.

^⑦ Arne Niemann, Zoe Lefkofridi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Neofunctionalism", in Antje Wiener, et al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6-49.

看法高度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二者都认为地区组织是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其作用相对有限。但与现实主义完全否定地区组织的作用不同,新现实主义承认其重要性,但认为主权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操控一体化的活动规则。与后者看法高度一致,政府间主义视地区一体化为国家追求国家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地区组织是国家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制定的政策实质上是各成员国政府妥协和交易的结果,地区组织框架下的活动至多是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延伸。^②

1.2 主要研究范式

所谓范式,是一种世界观,包括对基本单位、要解释的关键问题以及提供解释的理论是什么的看法。随着国际关系几次理论论争的展开以及范式概念的引入,国际关系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③旧地区主义研究主要承袭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并反映了二者的分野。

基欧汉(Keohane)认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一的自由主义,至少是在行为体、本体论、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国际社会史观等层面,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得以形成的。^④粗略地看,在本体论上,自由主义范式倾向于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优先性;行为体侧重于社会,其基本分析单位是国内社会中具有多元利益的团体或个人,在国际层面则拓展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强调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主义认可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但它并不认为世界政治必然导致冲突,相反,国家间可以合作;自由主义同时假定各行为体是理性的,合作的最重要驱动力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对于国家是独立自主的以及国家利益超越个人利益的观点,自由主义范式均持反对态度。^⑤

自由主义范式指导下的旧地区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新功能主义、沟通理论以及新制度主义

等。这些理论对地区一体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都强调经济利益或功能提升构成一体化的动力以及制度基础上的国家合作,尽管它们眼中的“制度”具有不同的面相。新功能主义的“制度”是建立政治精英支持的地区超国家组织,通过该组织运作的外溢效应实现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即建立超国家的政治实体。^⑥新制度主义内部对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倾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关注一体化过程中立法、行政、司法方面的“正式制度”,而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和传统。历史制度主义通过追溯特定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寻找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据此,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的诸多政策难以跳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欧盟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框定了相关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同时,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已形成历史惯性,成员国要摆脱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作为其分析前提,一方面,它视制度为外生、不变的变量,考察制度对个体行为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视制度为内生、可变的变量,研究特定情境下的制度为何呈现特定模式。^⑦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这一流派重点研究欧盟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的功能及运作,分析决策过程中制度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与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

^① 有关现实主义范式内部的争论,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

^②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No. 3, Summer 1966, pp. 862-915.

^③ 赵思洋:“自由主义国际思想:从国际关系理论回到思想史”,《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

^④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7页。

^⑤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0.

^⑥ Liesbet Hooghe & Gary Marks, “Grand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6, Issue 8, 2019, pp. 1113-1133.

^⑦ 刘伟、翁俊芳:“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在张力与发展限度”,《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2期。

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关注文化因素在利益偏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它尤为关注一体化过程中“欧洲认同”与“社会欧洲”的建构问题。^①这些理论流派从根本上挑战了当时权力政治主导国际关系的局面,均与自由主义范式强调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以及通过合作而非冲突来实现双赢的看法是一致的。它们着力解释一体化为何发生,视一体化进程为因变量,而自变量则分别为扩展或外溢(新功能主义)、沟通和交往的增加(沟通理论)、制度影响成员的偏好,从而促进国际合作(新制度主义)。沟通理论和(新)功能主义假定成员合作的偏好保持不变是催生一体化的关键,而新制度主义则假定制度能够改变成员偏好,使之趋于一致。^②

现实主义是旧地区主义研究广泛运用的另一范式。在本体论上,该范式坚持以国家为中心;在行为体方面,强调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权力;认为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存在等级之分,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坚持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斗争的国际社会史观。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作为其分析起点,国家是理性统一的行为体,既代表社会共同、持久的偏好,又能超越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权力最大化以及由这种权力所规定的国家利益。

在旧地区主义研究中,现实主义范式下的理论主要包括政府间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政府间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新功能主义的竞争性理论出现。遵循“国家中心论”传统,强调民族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地区一体化需服务于国家利益,后者决定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而一体化的节奏、进程及相关机构仍受主权国家的控制。霍夫曼甚至断言,欧洲一体化只限于低政治领域,而在高政治领域,成员国政府将不会接受一种不受其控制的一体化。^③的确,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们最初试图以建立联邦作为一体化的终极目标,但这一设想甫一出炉,就遭到众多成员国反对。直

至今天,欧盟的各项条约依然采用联盟而非联邦的字眼。新现实主义主要用于解释地区一体化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原因,或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不如”欧洲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家追求权力以提升其在国际体系的地位,一体化只是服务这一目标的手段;但国家参与一体化更关心相对收益;霸权国主导是一体化成功的必要条件;无论一体化如何发展,也难以改变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参与国际合作造成的对外依赖感到担忧,小国尤甚。

1.3 研究路径

在研究路径上,旧地区主义研究依循传统国际关系所倚重的历史主义、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三种路径。这些研究多从历史和法学的角度、以诠释的方式展开,相关成果以描述性、规范性分析为主。历史主义路径是指研究者采用历史的视角还原特定历史原貌或分析特定历史事件/行为体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例如,著名经济史学家米尔沃德(Milward)教授详细阐述了欧洲共同体的起源、形成和扩展的历史过程,强调了历史因素在欧洲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④这类研究并不追求因果律的挖掘,常常是描述性大于论证性。规范主义路径旨在研究人的行为准则,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包括价值导向和实践导向的规范研究。前者关注的重心是一体化所建构的共同体内的公平、正义等理想蓝图;后者的重心是一体化进程中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框架内规范的创设、演进、特征及影响等。哈斯(Haas)运用规范主义路径探讨了欧洲一体

^① 田德文:“欧洲一体化:回顾理论流变过程探析理论实践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日。

^② 韦进深、符春苗:“成员偏好对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1期。

^③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95, No.3, Summer 1966, pp.862-915.

^④ Alan S. Milward,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化背后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原则。^①经验主义路径是指研究者通过对现有一体化组织或机制的内在直觉、文化体验、感性观察和数据搜集,归纳总结一体化组织运作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例如,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及世界银行顾问巴拉萨(Balassa)利用经济数据分析了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对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②

综合来看,旧地区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争议以及研究范式的分野。王正毅教授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归功于三代学者的努力。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核心议题是寻求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和市场的关联性。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虽属于注重物质因素的理性主义范式,但在研究范式上形成了强调权力抑或市场何者主导的分野。^③从核心议题上看,旧地区主义理论所关注的一体化动因问题实质上是回答政治与经济关联性的问题,在研究范式上形成了政治驱动还是经济驱动为主的分野,这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议题和范式上是高度一致的。旧地区主义理论是从何种行为体居主导的角度来分析一体化的动力机制问题,更多地延续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传统。在这些解释中,现实主义范式下的理论流派强调国家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政府间主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的理性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结果;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一体化的动力来自国家追求权力及对相对收益的算计。自由主义范式下的理论流派不否认国家的重要性,但也重视超国家机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一体化的动力源和发展路径因而更为多元和立体。其中,功能主义强调功能性需求或技术变化;新功能主义强调不同政治行为体为追求各自利益施加压力而产生的相互作用;新制度主义则视一体化为国家应对相互依赖的办法,强调制度在促进地区认同及提升地区凝聚力的作用。因而,一个粗略的分野是:现实主义范式下的地区一体化更多充当了一种

强化民族国家和便于国家建构的手段,但在自由主义的范式下,一体化既是一个建立超国家机制的宏大目标,又是追求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决策权转移至超国家机构的过程。

二、新地区主义研究: “开放经济政治学”为主导

旧地区主义主要关注地区形成的内生过程,而较少关注外部和全球环境,新地区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因应全球化。^④后者在研究议题、研究范式和研究途径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创新。

2.1 研究议题

新地区主义研究重点关注以下议题:(1)解释地区主义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或不同部门自由化程度的差异。如下所述,外部性理论(Externality Theory)解释了不同地区一体化程度差异的原因,而米尔纳(Milner)研究了地区贸易协定中不同行业的自由化程度为何存在差异。有研究认为:南方共同市场不太可能发展出如欧盟这般的超国家治理机构,因为南共市成员国的政策精英在参与经济一体化时,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力图保持较大的国内政策自主权。^⑤

(2)成员国政府让渡主权的问题,^⑥大体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存在主权让渡。利特芬

^① Ernst B. Haas, *The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o-functionalism and Intergovernmen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 Bela Balassa,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Issu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3, No.2, May 1963.

^③ 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代发展,参见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10页。

^④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1.

^⑤ Karl Kaltenthaler and Frank Mora, “Explaining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Mercosu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1, March 2002, pp.72—97.

^⑥ 王正毅将新地区主义研究的核心议题概括为下述三类。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Litfin)将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视为其为了换取某些利益而愿意参加对其施加限制的“主权交易”(sovereignty bargains)。^①有学者分析了各国为何及何时愿意放弃部分主权以支持欧盟。曼纳斯(Manners)首次提出欧盟享有“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②此一概念后被写入欧盟官方文件。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不存在主权让渡。韦弗(Wæver)提出一个“系统性后主权”(systemic post-sovereignty)的概念,认为欧盟虽在欧洲事务上有其“欧洲逻辑”,但它不仅仅是国家的纯粹工具,欧盟的出现并没有对国家主权提出质疑。^③库利(Cooley)和斯普鲁特(Spruyt)提出不完全契约论(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意在说明国家如何划分和转让主权,解释为什么其中一些安排提供了稳定持久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些安排却失败了。作者运用权力的相对(不)对称性和地区国家对一体化的需求高低来解释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在协议完整性和超国家行为体权力的差异。^④

(3)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麦克纳马拉(McNamara)分析了欧盟成员国政府为何愿意放弃部分货币主权以建立统一的货币,她认为,金融部门过去的变革及资本流动国际化导致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使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当主导政府决策的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时,许多欧盟国家愿意放弃部分货币主权,转而采用共同货币。^⑤英格布里茨(Ingebriksen)采用主导部门分析方法,分析北欧五国为何愿意放弃主权,在冷战结束后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他认为,一国最大的经济部门(如瑞典的制造业或挪威的农业)可以影响其国内参与或不参与欧盟进程的政治议程。^⑥

(4)地区一体化和多边体制,如世贸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问题的看法比较分化。一派认为地区主义损害多边贸易体制;^⑦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地区贸易协定是通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桥梁,或者地区主义是全球化的必经阶段。^⑧第三种观点视地区主义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对霸权力量的反应,^⑨或在未能参加多边贸易

体制时为它们提供市场准入。^⑩对于上述争论,也有学者持折中态度,认为“现有的地区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没有解决这一问题”。^⑪

2.2 主要研究范式

新地区主义研究既延续了旧地区主义的研究范式,又深受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论战的影响。旧地区主义研究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范式逐渐融合为理性主义。二者存在观点上的交锋,但在本体论上都属于注重物质力量的物质主义。现实主义范式主张国家参与一体化是为了追求权力及服务于国家利益,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由国家利益决定,只有在符合参与国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推进。自由主义范式主张一体化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功能性

① Karen Litfin, "Sovereignty in World Ecopolitic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1997, pp.167-204.

②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38-2000.

③ Ole Wæver,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Solving the Sovereignty Puzzle in E.U.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8, No.2, Winter 1995, pp.389-431.

④ 所谓不完全契约,即协议文本含糊其辞并可能需在未来重新谈判。Alexander Cooley and Hendrik Spruyt, *Contracting States: Sovereign Transf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⑤ Kathleen R. McNamara, *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Christine Ingebriksen, *The Nordic States and European Uni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⑦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 "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and Multilateralism: Strangers, Friends or Foes?" In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 (eds.), *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96, pp.1-78; Anne O. Krueger, "Problems with Overlapping Free Trade Areas", Takatoshi Ito and Anne O. Krueger (eds.),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 Trade Arrangemen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⑧ Robert Z. Lawrence,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⑨ Theodore Pelagidis and Harry Papatotiriou, "Globalisation or Regionalism? States, Markets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8, 2002, pp.519-535.

⑩ Diana Tussie, "Regionalism: Providing a Substance to Multilateralism?" in Fredrik So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⑪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3, Summer 1999, pp.589-627.

的需求或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超国家制度并非有形物质,但其作用在于能够提供物质回报,有助于扩大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持相似的物质主义世界观,强调行为体行为的动因是追求权力或利益。在认识论上,二者属于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把国家定义为单一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它会仔细权衡可供选择的各项行动的成本,并寻求效用最大化;自由主义也以社会行为体的理性主义假定作为分析的起点,理性的行为体寻求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收益。因而,两者都倾向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认为行为体的利益和身份外在于国际体系并且是均质的。一言以蔽之,理性主义范式采用方法论个体主义,强调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对地区主义发展的影响,试图将政治和经济这些物质因素作为理性分析的最基本的要素。理性主义范式助推了新地区主义研究的科学化倾向。

莫劳夫奇克(Moravcsik)的自由政府间主义(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范式融合的典范。一方面,该理论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假定,即影响一体化政策制定的行为体是多元、理性和自主的,行为体基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行事,他们之间的博弈影响政策选择;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政府间主义的现实主义范式,坚持政府是决定地区一体化最重要的行为体而超国家机构的作用无足轻重的假设。此外,该理论认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观点,即经济利益(而非地缘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是一国参与地区一体化与否的最重要动因。^①通过多个理论的融合,自由政府间主义成为解释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理论。

在理性主义占主导的同时,新地区主义研究更广泛地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范式。建构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即把物质利益看作行为体参与一体化的唯一和最主要的解释;否认国家利益是给定的,而是身份界定的;行为体选择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以及制度的形成和运作,是由价值、观念、身份、文化等建构和塑造的,因而其本体论不是物质主义。在方法

论上,建构主义承认科学实在论,倾向于认知分析方法,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不仅影响行为体的行为,而且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

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付诸实施,欧共体立志要建立政治联盟和经货联盟,欧洲认同问题变得愈加重要。1999年《欧洲公共政策》杂志发表“欧洲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特刊,正式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建构主义议程,成为建构主义公开挑战理性主义的标志。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核心是一个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共享的观念和正面的集体身份有助于促进一体化建设。这一研究范式主要关注:观念因素对一体化偏好的影响;谈判和决策的主体间背景如何影响一体化的结果;欧洲一体化及其制度对共同体建设的影响。里塞(Risse)强调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意义建构、话语和语言的重要性,认为包括欧盟在内的社会机构的构成特征不仅限制行为体的行为,还影响其身份、利益和偏好。但他认为,建构主义可用于提出集体身份建构、一体化对国内政治影响等假设,或用于补充现有的一体化理论,但要期待一个完全成熟的建构主义地区一体化理论或许是不可能的。^②

麦克纳马拉(McNamara)是运用建构主义范式分析欧洲货币体系的代表。对于欧洲国家为何同意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她反驳了国家利益是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或国内经济条件决定的观点,将观念因素引入分析,认为国家利益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过程中建构的。具体而言,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一个由政治和金融精英组成的“认知共同体”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形成。该团体反对政府干预,认为低通胀目标优先于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并认为此主张有助于解决当

^① 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1, No.4, December 1993.

^② Thomas Riss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Antje Wiener,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时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汇率政治三难”,欧洲货币一体化就是他们所推动的。^①

建构主义在其他地区的一体化研究中也并不乏身影。阿查亚(Acharya)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即从“东盟方式”中构建一种“亚太方式”的区域身份,但在形成聚合各行为体利益的地区认同方面仍然存在重大障碍。^②当然,建构主义的分析亦有其局限性,一是难以准确追踪理念、认知的传播过程;二是建构主义长以解释长期变化,但疏于分析短期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

2.3 研究路径

实证主义逐渐成为新地区主义的主导性研究路径。实证主义坚信社会客观规律的真实存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结论的可检验性;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可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究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和主要行为体有规律的行为模式。简言之,实证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取向奠定了基础。

“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是实证主义在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研究路径。其核心研究纲领是探索国际经济开放与国内制度和利益分化的互动影响;研究路径是分析国内行为体对该国实施何种对外经济政策的偏好,以及这种偏好如何通过国内制度聚合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这一路径实际上聚焦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打通了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找回了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所忽视的国际体系运行的国内微观基础。^③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代际变化相对应,新地区主义研究在研究路径上相比旧地区主义研究出现了以下显著变化:

其一,拓展了权力/利益和制度的内涵,重新回到国内并建构了以国内社会行为体为中心的分析范式,探讨国内政治过程或国内制度和利益与地区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旧地区主义研

究者广泛使用这两个变量进行研究,与之相对照,新地区主义研究者的一大创新在于:挑战“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假设,打开国家的“黑箱”。具体而言,与上一代强调国家权力或国家间制度安排不同,新地区主义研究更加关注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国内制度安排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以米尔纳(Milner)的研究为例,她认为:地区贸易协定中不同行业的自由化程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规模报酬递增以及是否是出口导向的企业;而政府是否签署地区贸易协定则取决于消费者剩余规模、特定行业支持和关税收入的综合考量。^④蔡斯(Chase)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商业团体如何推动北美、西欧和亚太三大贸易集团的兴起,认为它们主要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或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⑤

与上一代将权力主要限定为国家的最高谈判权和决策权不同,新地区主义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东盟中心性”,强调东盟而非霸权国美国或作为大国的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作用,这与现实主义强调霸权国的主导权力明显不同。权力的范畴甚至拓展到与国家相对的市场。卡赞斯坦等人强调网络化权力(network power)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体现为以企业为基础的日本生产网络和以族群为纽带的华商商业网络,它们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动力。^⑥对非正式制度的强调固然为分析东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

^① Kathleen R. McNamara, *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 - 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Issue 3, 1997, pp.319-346.

^③ 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97-124页。

^④ Helen V. Milner, “Industries, Governments, and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Trade Bloc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77-106.

^⑤ Kerry A. Chase, *Trading Blocs: States, Firm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⑥ Peter J. Katzenstein &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视角,但也容易忽视其对地区经济可能带来的潜在道德风险。

在制度层面,国内制度对一国签署贸易协定的意愿以及签订何种类型的贸易协定有重要影响。有研究表明,民主国家更有可能生成贸易协定。^①另一项研究以1950—1999年间签署的优惠贸易安排为样本,发现一国国内否决权者数量的增加将降低贸易协定签署的可能性。^②

其二,新地区主义研究更重要的创新是将制度和权力/利益这两个关键变量结合起来,分析二者的相互作用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在旧地区主义研究中,权力/利益和制度被割裂开来,对于二者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一体化的影响基本未涉及。在新地区主义研究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范式从分裂走向融合。马特利(Mattli)的外部性理论(Externality Theory)是运用制度和权力两个自变量解释地区一体化程度高低的另一例证。该理论认为,成功的地区一体化需同时满足两大条件:在需求侧,因市场扩大而带来的收益增加预期将激励企业扩大跨境贸易和投资,此一需求又将驱使他们努力游说政府签署相关的地区协定,减少因他国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及金融风险所产生的外部性;在供给侧,一体化能否发生及推进,取决于地区内是否存在无可争议的领导国,该国愿意在协调规则、法规、政策时发挥核心作用,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并通过扮演地区的“出纳员”缓解分配紧张的情况。^③

三、比较地区主义与多元范式的兴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主导路径,即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开放经济政治学赖以成长的土壤,即全球化,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遭受严重冲击,“反全球化”浪潮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作为地区一体化实践和理论的最主要阵地,欧盟备受欧债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危机爆发所暴露的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弊病,开放经济政治学又无法为变革中的全球和地区

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基于对新地区主义研究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试图开辟新的研究议题、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

3.1 研究议题

(1) 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

该领域的领衔学者索德鲍姆将比较地区主义定义为: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世界)地区和地区主义。^④显然,这一定义更多地强调比较的方法,但对其内涵和外延并未进行缜密周详的界定。尽管学科边界尚待厘清,但阿查亚仍笃定“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⑤如果仅从研究方法来界定某一研究领域,那么,此前的地区主义研究也存在比较研究,比较地区主义到底有何不同?徐秀军等认为,新、旧地区主义的比较多是割裂性的,基于狭隘的欧洲一体化经验或以其为范本,不同地区间缺乏平等与对话,而比较地区主义则是一种基于全球视野的去中心化比较。^⑥除此之外,耿协峰强调比较地区主义在理论路径上追求包容和折中,在议题领域超越了贸易与安全。^⑦王志提出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重点是沿着“共享与授权、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完全和不完全契约”三个维度,研究“国家间合作形成的正式制度,及此类制度间的差

^① Edward 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and B. Peter Rosen-dorff,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Issue 3, Summer 2002, pp.477-513.

^② Edward 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and Jon C. Peve-house, “Vetoing Co-operation: The Impact of Veto Players o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7, No.3, July 2007, pp.403-432.

^③ Walter Mattli, “Explain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1-67.

^④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30-35.

^⑤ Kevin Parthenay,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Why Bother (Again?)”,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Regionalisms: Perspectives for a Comparis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1-16.

^⑥ 徐秀军、沈陈:“中国视角下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

^⑦ 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

异、效果与结果”。^①除制度外,魏玲认为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范围还包括比较不同地区的秩序构建和治理实践。^②

因而,就比较的对象而言,如果说此前的地区主义研究侧重解释一体化的动力、成效、制度化程度等的差异,那么比较地区主义主要比较不同地区一体化的不同结果和不同轨迹,^③同一地区不同行业的制度/机制或不同领域的政策差异,另一热点则是地区治理和地区秩序。例如,布伦纳(Brennan)和默里(Murray)从物质、观念和规范三维度比较分析了欧洲和亚洲的地区主义的驱动因素。^④有学者对亚洲的区域化组织进行比较,并按照经济、政治和战略议题进行分析。^⑤大量文献探讨特定议题领域的地区治理,解释在特定地区、特定功能领域地区治理兴起的动因、相关制度设计和产生的影响。博泽尔和里塞主编的手册将地区治理定义为“在地区层面上就某个议题领域进行社会协调的制度化模式,目的是产生约束性的规则和公共产品及服务”。该书共用了8章篇幅探讨地区安全、贸易、金融、发展、社会性别、环境、移民和民权的治理,足见地区治理在第三代研究中的份量。^⑥索德鲍姆(Söderbaum)比较分析了存在于非洲的三种特殊的地区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地区治理、促进主权的治理和地区影子治理,他批判性地评估了这三种治理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其长期可行性。^⑦

在地区治理的理论创新方面,多层治理理论在学界广为流传。这一理论认为欧盟是多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参与治理的行为体是多元的,包括超国家、国家、地方政府、监管机构、协会、各种公私实体等,权力因而是多中心的,它们覆盖整个地区的政策网络。权力在纵向上跨越不同的领土层次,在横向上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享。故此,该理论否定国家的单一性,认为政府间的集体决策以及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欧洲议会的自治作用,导致单个国家的主权被稀释。在供给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分享权力;在需求端,治理的需求来自于全球化、集中化和一体化与

地方化、分散化和碎片化之间的多样化矛盾和冲突。^⑧显然,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范式。庞中英教授则运用“共生秩序”这一概念,创建性提出一种多重权力竞合的东亚地区治理框架。^⑨

实际上,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第一波热潮出现在世纪之交。^⑩早在1996年,卡赞斯坦对亚洲和欧洲的一体化进行了比较研究。^⑪马特利1999年出版的专著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一体化的项目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美、北美和亚洲的一体化项目,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一体化计划成功而许多其他计划失败,何种力量推动了一体化,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外部国家寻求加入。作者强调了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在

① 王志:“比较地区主义:理论进展与挑战”,《国际论坛》,2017年第6期。

② 魏玲:“全球转向下的比较地区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36-147页。

③ 劳森比较了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欧亚大陆地区主义的不同结果和不同轨迹。Fred H. Lawson (ed.),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Routledge, 2009.

④ Louis Brennan & Philomena Murray (eds.), *Drivers of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urope and As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15.

⑤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Routledge, 2012.

⑥ Tanja A. Borzel and Thomas Riss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apters 14-21.

⑦ Fredrik Söderbaum, “Mode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Africa: Neoliberalism, Sovereignty - Boosting and Shadow Networks”,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0, No.4, November 2014, pp.419-436.

⑧ Liesbet Hooghe, Gary Marks, and Arjan Schakel, “Chapter 11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Daniele Caramani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⑨ 庞中英、黄云卿:“演进中的共生秩序与多重权力竞合:一种东亚地区治理框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39-51页。

⑩ 相关研究可参考:Edward L. Mansfield &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Michael Keating & John Loughli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Routledge, 1997.

⑪ Peter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1, No.2, June 1996, pp.123-159.

决定一体化结果方面的重要性。^①

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虽言要摆脱“欧洲中心论”,但众多的相关研究仍以欧盟作为参考或比较的对象。金敏亨(Min-hyung Kim)和卡波拉索(Caporaso)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视角比较和评估了欧洲、亚洲和拉美的一体化,揭示了霸权及其导致的权力关系对三地一体化的不同影响,认为地区一体化既是霸权国和中等强国之间政治互动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②亦有学者运用定量分析和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美洲、亚洲和欧洲地区一体化案例(1975—1995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③当然也存在不以欧盟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王慧芝和曾爱平比较了拉美和非洲的一体化模式,认为拉美虽未出现像非统和非盟这样的单一地区组织来规划统筹一体化实践,但拉美经济一体化程度总体上高于非洲。但两地经济具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和内部分割性,一体化组织多为制度导向型,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且机构数量众多,交叉重叠比较严重。^④

与此同步的是,第三代对跨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现象给予了更多关注,试图从规范扩散和欧盟对外政策的视角解释这一现象的兴起,或者探讨跨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对特定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影响。^⑤

(2) 大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图景。在欧洲,法德是驱动欧洲一体化的关键角色。虽然在过去几个世纪两国国内均发生剧烈变化,存在持久分歧和根本性国际变革,但法德何以能一直保持紧密关系?两国对塑造一体化的影响虽然至关重要,但在不同政治领域和时间为何却很不均衡?克勒茨(Krotz)和希尔德(Schild)运用一种“嵌入式双边主义”的方法回答了上述问题。^⑥随着对欧洲以外地区主义的日益关注,全球性/地区性大国在一体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学者分析了美、中、俄在亚太地区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亚太地区主义受到全球大国(尤其是中美)的主导和竞争的挑战,它们阻碍了东盟共同立场

和行动的发展,从而限制了进一步的一体化建设。^⑦在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经历了从显著成功到停滞不前且未能达其最初目标的过程,坎波斯(Campos)将其归因于巴西在塑造拉美一体化方面的领导力的变化。^⑧

(3) 各种重大危机性事件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这些事件既包括影响波及全球的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又包括地区性的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大量研究关注这些事件对特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例如,有学者比较研究了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解释两次危机对地区机构的影响为何不同,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根源。^⑨英国脱欧

^①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Min-hyung Kim and James A. Caporaso (eds.), *Power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Europe,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Routledge, 2021.

^③ Yi Feng & Gaspare M. Genn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Homogene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 Pacific Asia and Wester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2, May, 2003, pp.278-309.

^④ 王慧芝、曾爱平:“拉美与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比较:基于历史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

^⑤ 相关文献可参考:Francis Baert, Tiziana Scaramagli, Fredrik Söderbaum (eds.), *Intersecting Interregionalism Regions,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EU*, Springer, 2014; Tobias Lenz, “Spurred Emulation: The EU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MERCOSUR and SADC”,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5, Issue 1; 2012;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Civilian Power or Soft Imperialism?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10, Issue 4, 2005.

^⑥ Ulrich Krotz and Joachim Schild, *Shaping Europe: France, Germany, and Embedded Bilateralism from the Elysée Treaty to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⑦ Evi Fitriani, “Regionalism and Global Powers”, in Nicholas Farrelly, et al (eds.), *Muddy Boots and Smart Suits: Researching Asia-Pacific Affairs*,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7.

^⑧ Gabriela Lomeu Campos, “From Success to Failure: Under What Conditions Did Mercosur Integrate?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31, No.4, December 2016.

^⑨ Ralf Emmers and John Ravenhill, “The Asian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onsequences for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RSIS Working Paper No.208,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6, 2010, <https://www.files.ethz.ch/isn/120284/WP208.pdf>.

不仅引发欧盟可能解体的猜测,而且催生了人们思考去一体化问题。罗萨蒙德(Rosamond)认为,应将英国脱欧是否导致欧盟解体视为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并考虑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所嵌入的民主资本主义契约的解体。^①

3.2 研究范式

与理性主义成为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主导范式不同,比较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除理性主义范式外,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等被更多地纳入地区主义研究。后三者均批判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范式。第一,认为开放经济政治学过于强调理性主义逻辑支撑下的物质主义,忽视观念、认知、身份等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作用,也忽略了利益分配的影响。固然,物质利益是国家和国内行为体参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但将之视乎这些行为体的唯一动力则夸大了物质利益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非物质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麦克拉伦(McLaren)从认知和身份的视角检视了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在不断高涨。他发现:欧盟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多面向的反应,包括功利主义、成本效益计算和非经济反应;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应并非仅仅围绕物质利益考量,理性的欧盟领导人不能忽视公众舆论可能对整个一体化事业带来的风险。^②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各行为体是否有足够的理性和预见力来预判一体化可能导致的收益和成本。即便某一群体内的成员能够形成利益共识,但各行为体的利益如何转化为国家政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中间既涉及群体所能调度的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群体间的博弈、政府自身的观念和偏好等。欧洲一体化对于一些欧洲社会精英而言可能将提供大量自我实现和致富的机会,但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考虑一体化的具体收益或成本可能很困难。^③

第二,认为国内行为体的偏好与外在的国际体系相互隔绝,后者对国内政策过程的影响无足轻重。对内,开放经济政治学假定一国政

府具有完全的政策自主性,其决策不受其所处的国际体系或他国政策的影响和约束。这一假定固然有助于简化分析,但显然,对于该范式所强调的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而言,该假定显得异常突兀。对外,开放经济政治学过于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变革或不稳定性对不同国家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形成以及各国政策取向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理念的经济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在经历霸权趋于衰落的20世纪70—80年代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重新得以巩固,“开放”经济秩序得以维护。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新兴国家的崛起、俄乌冲突等,都在不同程度地预示着美国霸权体系的动摇。在此情形下,各国政府及大型企业更加重视产业链的安全,而非一如既往地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和高回报利润。

第三,过于追求“科学化”,忽视历史和文化对不同行为体的影响。开放经济政治学坚持物质决定论的理性主义,假定包括国家在内的各行为体都是理性的,研究如何通过理性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都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实际上受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约束,脱离价值判断的经验性研究实则反映了那些特权群体的利益,研究者不应忽视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

因此,除理性主义范式外,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等被更多地纳入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后三者均强调认知、观念、文化、价值判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注重历史和制度分析,主张用历史、法律的方法来阐释国际关系。秦肯小结了英国学派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他将该学派的三大核心概念(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世界社会)与地区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地

^① Ben Rosamond, “Brexit and the Problem of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12, Issue 4, 2016, pp.864-871.

^② Lauren M. McLaren, *Identity, Interests and Attitud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③ 同②。

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具体条件。^① 巴里·布赞和张永进探讨了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地区层面上是否存在重要而独特的国际社会结构,以及英国学派在理解东亚地区秩序方面的见解。^②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为“对主流话语背后的实证主义、问题解决宗旨、技术统治旨趣以及战略理性的限制与批评的态度”。^③ 其主要代表人物考克斯(Cox)认为,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解决问题理论”往往将人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视为既定,而批判理论则要“揭示理论所受到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④ 查特吉(Chatterjee)运用批判理论,分析了南亚地区为何具有巨大合作潜力,但却依然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通过对身份和社区的人类学解读,她指出:所有南亚国家的精英都难以摆脱现实主义的视角,要推进地区合作,该地区的政治文化需经历根本性的转变。^⑤

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还尝试对不同研究范式进行融合。新、旧地区主义研究试图仅靠某一两个变量来解释地区主义这样的复杂现象,显然其解释力有限。经过此前的理论论战,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谁也无法取代谁,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试图进行融合。“比较地区主义在不同理论之间提供了折中路线,不仅试图沟通新旧地区主义的范式之争,还将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等不同研究路径整合起来,进而建立一个更全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⑥ 霍克(Hooghe)和马科斯(Marks)提出的后功能主义理论是这种范式融合的结晶。它运用一个身份认同、绩效与分配三者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一方面,该理论否定了传统的“精英决定论”,借鉴新功能主义的多元主义范式,认为一体化是包括政治精英、政党、跨国利益集团和公众等多元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既强调经济利益对上述行为体的影响,部分沿袭理性主义的分析路径,又将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作为重要解释变量进行考量。^⑦ 瓦利-拉克(Warleigh-Lack)试图建立一个解释不同地区化类型

的起因、功能及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尝试进行以下范式融合:一是融合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范式,从全球宏观视野分析不同地区化的特点;二是运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欧洲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三是建设性地对新地区主义理论与批判主义进行了融合。^⑧ 其理论对于理解不同地区的地区化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一框架显得异常庞杂。

3.3 研究路径

与其主张的研究范式相对应,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路径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打破“欧洲模式中心论”和“欧洲模式例外论”。在理论层面,新、旧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基于欧洲经验,任何一体化理论都难以绕开欧洲模式这一典型案例。比较地区主义开启了欧洲经验的脱魅化,更加关注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实践。一方面,现实中的欧盟遭遇的重重危机,大大削弱了欧洲一体化的标杆意义。鲁曼(Reumann)和莫雷(Murray)认为:“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看法,即欧盟不是一个可随意复制到其他地区的机构。虽同为

① 秦肯:“英国学派的新探索:从全球主义到地区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3-119页。

② Barry Buzan and Yongjin Zhang (eds.), *Contes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郭树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渊源、理念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④ 李少军著:《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第83页。

⑤ Shibashis Chatterjee, “Critical Theory Approaches t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 Asia”, in Sumit Ganguly & Frank O'Donnel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 Asia*, Routledge, 2022.

⑥ 徐秀军、沈陈:“中国视角下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28-135页。

⑦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A Post 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1, pp. 1-23; Dirk Leuffen, Berthold Rittberger, Frank Schimmelfennig, *Inte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ory and Polici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Chapter 6 Postfunctionalism”.

⑧ Alex Warleigh-Lack,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gionalisation: Bridging ‘New Reg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2006, Vol. 13, No. 5, p. 758.

地区机构,东盟和欧盟却有很大不同”。^①另一方面,比较地区主义认识到地区一体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扬弃“欧洲模式中心论”和“例外论”,将其视为众多地区一体化实践中的一个,该案例与其他案例处于平等地位。索德鲍姆强调需要从全球视野来重新思考地区,把欧洲一体化的案例编织进比较地区主义的叙事,以服务于更宏大的理论建构。^②魏玲指出,比较地区主义“旨在化解欧洲中心主义”,在构建多元的地区合作理论体系时,需要关注“世界不同地区的背景知识和地方能动”。^③无论如何,要取得更大的理论突破,地区一体化研究学者不能不更加重视非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实践的经验。

二是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并存,研究路径和方法多元。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运用的是科学方法,而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反对包括行为主义在内的实证主义,主张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后实证主义反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认为科学不可能完全客观,一切理论都是建构出来的,故通过认识偏见的可能影响来追求客观性,强调地区主义研究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注重诠释性的研究方法。

四、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地区主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既受一体化理论发展脉络的影响和制约,又与一体化实践及其所处的全球体系密切相关。研判的趋势之一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地区主义研究将面临地区一体化与逆全球化、地区合作与安全议题的互动以及地区主义制度武器化等新议题。过去的地区主义适逢全球化的兴起,全球化大潮几乎将各经济体卷入其中,各国在自由国际体系下相互竞争但又基本相安无事。在此背景下,尽管存在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的争论,但客观而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顺应及推动了全球化的高涨。然而,俄乌冲突、中东纷争以及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加剧了世界的裂痕,而且导致他国选边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地缘政治复兴,为了摆

脱全球生产链或地区生产网络所带来的两难困境(为吸引外资而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与为提高本国经济独立性而加强对外企的监管和限制),众多国家要么诉诸丰裕要素武器化,以期应对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如美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要么运用全球或地区制度的武器化,^④构建排除特定国家的产业链,典型的如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其结果是,一方面,预计将产生一些新的且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地区经济、技术联盟和产业链的整合,^⑤如美国为打压中国所建立的“四方芯片同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围绕地区制度展开竞争,导致亚太出现地区及功能重叠与大国互斥的“竞争性区域主义”现象。^⑥在大国竞争加剧带来的选边压力以及其他危机事件的催化下,既有的地区一体化形态有可能走向分化,甚至面临新的分解压力。

此外,随着安全议题重要性的凸显,贸易、投资、技术竞争、产业链重组、地区整合与安全的互动有望成为地区主义研究的新热点。“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日渐超出政治与经济范畴,基于泛化的安全考量日益嵌入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与活动”。^⑦新冠疫情肆虐给许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供应链危机,由此众多国家强调要确保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关键供应链安全。为了维持其霸权优势,美国肆意打压他国,引用国内法对他国实施制裁,甚至威胁脱钩,这一做法加剧了众多国家对本国重要产业链安

^① Laura Allison-Reumann & Philomena Murray, “The EU and ASEAN after Brexit”, *East Asia Forum*, January 3, 2017, <https://eastasiaforum.org/2017/01/03/the-eu-and-asean-after-brexit/>, para.3.

^②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0.

^③ 魏玲:“全球转向下的比较地区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4期,第136-147页。

^④ 王正毅:“地缘政治竞争为何复兴?”《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29页。

^⑤ 有学者也视其为“逆地区化”。

^⑥ 姚全、郑先武:“亚太竞争性区域主义及其地缘影响”,《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第1-14页。

^⑦ 徐秀军:“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的新扩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11日。

全的担忧;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则推动各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因此,在研究议题方面,未来的地区主义研究不能不对地区一体化制度的武器化,以及关键技术和商品供应链、产业重组、技术联盟、战略投资、地区整合等与安全议题的互动做出回应,或对上述课题注入更多的安全化视角。

趋势之二是延续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中的范式融合。尽管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地区主义研究“科学化”的基石,并仍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导,但以观念和认知分析为主的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研究范式也将获得更多的青睐。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大搞“价值观外交”,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以意识形态划清敌我,而且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联手盟友,建立技术的“民主同盟”,打造“无中俄”的供应链。“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虽过于简单化,但在国际关系中却因为西方世界掌控话语权而普遍存在,进而使得观念和认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因而,为了提高对不同的地区一体化实践的解释力,需要结合运用不同的研究范式。范式的融合固然有助于提高地区一体化理论的解释力,但随着分析层次和解释变量的增加,多元范式的使用导致相关理论越趋复杂,缺乏简约性。

趋势之三即为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比较地区主义强调不同地区整合、地区治理和地区秩序的比较,但这一研究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与该领域的碎片化有关,欧盟研究与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之间缺乏互动;相关学者几乎没有关于比较研究基础的系统辩论,不同理论立场和研究传统的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① 假以时日,学者间的交流以及不同学科的碰撞应能缓解这些问题,但更根本性的问题可能诚如邢瑞磊所担忧的:虽然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但除了缺少综合性的比较理论框架外,这一研究领域还面临方法论的难题,即如何比较不同形态的地区合作;如何处理欧洲经验的代表性和特殊性;多元的分析层次及其所带来的过多的解释变量;关键变量的选择偏倚问题。^②

趋势之四,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一体化退潮也是未来地区主义研究面临的一个难以绕开的重要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体化遭遇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重重挑战,当前的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巨大冲击及其在欧盟内部造成的分裂,疑欧政党在欧洲政治版图中的崛起,未来是否出现第二个“英国脱欧”?相关成员国退出欧盟,意味着业已形成的跨产业链和商业联系被迫中断,这将对欧盟的合作机制及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欧盟的挫折又对其他地区一体化产生什么影响和启示?这些都是未来地区主义研究需深度思考的问题。与地区一体化理论相比,目前在解释去一体化方面尚未产生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去一体化(disintegration)将可能受到更多的关注。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林德伯格(Lindberg)和沙因戈尔德(Scheingold)曾提出“倒溢”(spillback)概念来解释欧洲一体化的倒退。^③ 随着欧洲一体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激活,这一理论思考并未延续下去。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学者重新致力于去一体化的理论思考。2012年10月《民主》杂志出版了“欧洲去一体化”的专刊,探讨欧债危机的根源,欧元区会否完好无损,欧盟是否解体,等。牛津大学教授齐隆卡(Zielonka)提出了一个基于三种假设场景的去一体化理论,即突然解体、加入联邦和新的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他认为,新的中世纪主义将成为欧洲一体化最有可能的发展前景。^④ 李明明分析了欧洲垂直去一体化

^① Philippe de Lombaerde, Fredrik Soderbaum, et al, "The Problem of Comparison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6, No.3, July 2010, pp.731-753.

^② 邢瑞磊:“比较地区化理论评析:一种方法论的视角”,《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Leon N. Lindberg and Stuart A. Scheingold, *Europe's Would-Be Polity: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rentice-Hall, Inc., 1970.

^④ 新的中世纪主义,即某些领域的一体化不断加深,但其他领域的一体化依然很弱,不同一体化框架下有不同的成员国参与其中。Jan Zielonka, "Disintegr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Europe's Crisi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3, No.1, Winter/Spring 2012, pp.51-59.

的理论逻辑,包括功能性倒溢、成员国收回主权、欧盟制度退化和欧盟政体解体。^①面对欧盟的实践困境,学界关于“多速欧洲”“差异性一体化”等的研究已成新的研究热潮,但这种一体化程度或速度的差异化将对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地区治理和地区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或许将成为地区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结 论

纵览地区主义的相关理论,可以发现以下特点:第一,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早期的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理论建构并不局限于欧洲,但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无疑是众多地区主义理论阐释的重心。其结果是:地区主义理论主要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的特殊性,而欧洲一体化的相关理论“一定程度上被奉为其他地区一体化实践的理论坐标”。^②第二,地区主义研究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欧洲投射到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世界其他地区开启一体化的原始条件、途径和目标诉求等方面与西欧有很大的不同,打破“欧盟中心主义”,研究非西方的地区主义实践因此成为比较地区主义的重要使命。第三,理论本身的“局域性”。因为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体化往往出于不同的动因,一体化的方式以及追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目标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解释不同地区一体化实践的普适性理论。第四,不同一体化理论间既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延续性。不同范式下的一体化理论呈现一定的阵营化特征,但理论间的区隔并非泾渭分明。这使得理论的类别化成为可能,但不同的理论仍存在相互借鉴的要素。诚如宋新宁教授所言:“各种(一体化)理论之间既相互论争,又彼此借鉴,形成一种在争鸣中共同发展的联系互动。”^③第五,理论创新的折中主义。地区主义理论经历了从注重制度或权力/利益等单个变量,到注重双变量的组合,再到多个理论范式的综合和折中。

整体而言,地区主义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既

与全球各地区的一体化实践及变革密不可分,又与其所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乃至更大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论及演进密切相关。旧地区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部分核心议题,特别是一体化动因问题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旨,即关注政治与经济关联性的问题,是高度一致的;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主导范式的旧地区主义研究偏重单一变量,强调权力/利益或制度在促进地区一体化中的作用,由此形成政治驱动还是经济驱动为主的分野,这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范式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在研究路径上所遵循的历史主义、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路径也殊途同归。以自由政府间主义、外部性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代表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在部分议题上(如解释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部门的一体化程度,各国为何及何时愿意放弃部分主权等)完全契合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相互作用的研究主旨;二者均以理性主义为主导范式,同时引入了建构主义范式;在研究路径上新地区主义研究不仅拓展了权力/利益和制度的内涵,而且将二者结合起来,应用国际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动因分析,这与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框架完全一致。就比较地区主义与第三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而言,在议题上,二者都更加关注体系或地区层面的宏大问题,对全球或地区的制度和治理进行反思。在研究范式上,二者均更为多元,并进行了理性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大融合;在研究路径上,二者在批判和修正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基础上,探索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更重视认知、文化、价值判断的作用。综上,虽然地区主义研究只是在部分议题上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旨的代际变化,但三代

^① 李明明:“欧洲去一体化—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

^② 王晨星:“欧洲区域一体化理论适用性探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4日。

^③ 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2-9页。

地区主义研究与三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范式和路径上高度一致。未来的地区主义研究很可能更关注非西方的地区实践,迎合地缘

政治的复兴,重视去一体化以及一体化制度武器化等议题,并预计将延续多种范式的融合。

责任编辑 邵雯婧 邓文科

Regionalism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Its Releva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HEN Shaofeng ¹

(1.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studies on regionalism are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regionalism and its relevance to IPE. From the angles of central topics, major research paradigms and research approach, the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ajor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regionalism over the past 70 years, expounding its theoretical relations with IP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tudies on regionalism generally follow the major skeletons of IPE. Some research questions on regionalism conforms to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IPE. In terms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research approach, it has transitioned from the old regionalism's focus on a single variable, namely power/interest and institution, to the new regionalism's combined analysis of the two variables, and then to the comparative regionalism's compromise of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which has laid emphasis on cognition, ideas and culture. This generational change is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IPE development. With the resurgence of global geopolitics, future studies on regionalism will continue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focusing more o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weaponis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s, de-integration, as well as interactions among regional integration, technologic competition,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ld regionalism, new regionalism, comparative regionalism